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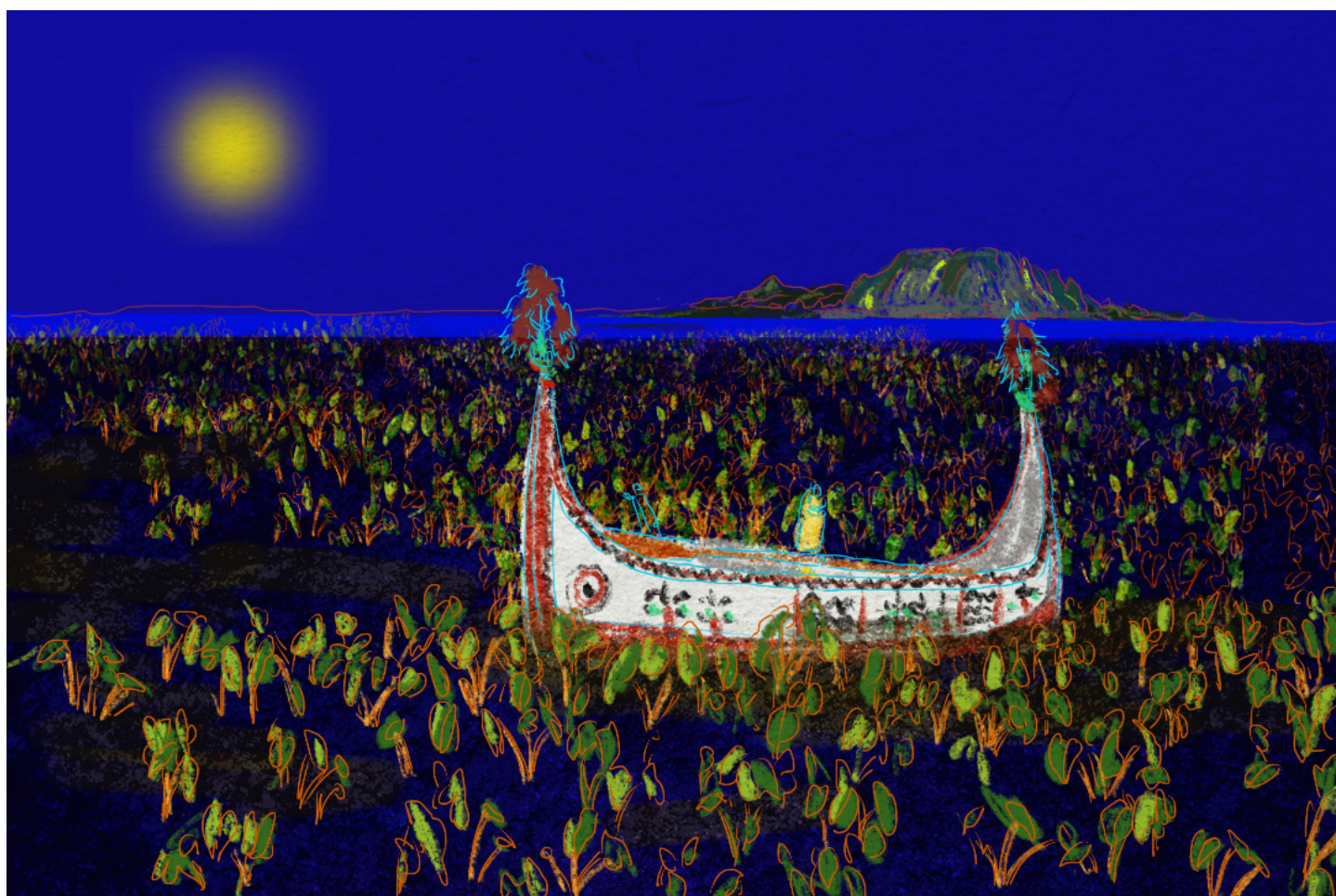


深度 异乡人

异乡人——谢福美：回到兰屿，一个达悟女人的两种生活

当年18岁的谢福美，自然地走向“大岛”，去外面的世界闯闯看看。待她回到原乡，生活二十余年，却几乎成为精神上的异乡人。

特约撰稿人 金其琪 发自兰屿 | 2017-11-24



谢福美的第一部纪录片，取名为《男人的海洋，女人的水芋田》。达悟文化中，海洋由男人主导，陆地的工作则交给女性，部落的家庭分工才令岛屿完整。图：Tsengly / 端传媒

Sinan Yongala, 你到底是谁？

从大岛返回小岛21年了，她每一日的生活，都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Sinan Yongala，是兰屿达悟族东清部落的一个母亲、妻子和女儿，Sinan意为母亲，Yongala是她长子的名字。汉人改变达悟人的命名方式，将户籍制度植入她的家族，命这家族的亲生兄弟一个姓黄，一个姓谢，姓谢的是她的爷爷，她就被取名叫谢福美。

“大岛”是兰屿人对台湾本岛的称呼。在大岛的汉人于20世纪进入小岛之前，这个距离台东90公里、离菲律宾巴丹群岛99公里的兰屿岛上，达悟人依海而居，男人潜水射鱼，女人上山耕种，从不曾想过“大岛”的事。

那时，达悟语吟唱的古老歌谣中，劝人不必急著出门，唱的是：“难道你要去巴丹岛吗？”但到了Sinan Yongala父母的年代，老人的吟唱变成了：“你们几时才会回到家乡？……那个台北，是你们不断回去的地方。”

现在没什么人叫她Sinan Yongala了。大家都叫她谢福美，是那个“住在xx民宿后面”，“兰屿第二家7-11旁边走上去的”，那个拍纪录片的福美。货币经济、观光业、连锁企业和来自都会的汉人不断进入她的岛屿，也勾起年轻人对大岛的无限憧憬。

“好想出去，去外面闯一闯看一看。”当年18岁的谢福美，就这样自然地走上了几乎每个兰屿年轻人都不可避免的道路，可是3年后回到原乡，却差点成为精神上的异乡人。



因为想了解兰屿的文化，谢福美把自己的家庭拍成了一部又一部纪录片。摄：郑宇骐/端传媒

离开小岛，去大岛做异乡人

谢福美出生的东清部落，正对清晨海上的第一道阳光，可是也和其他五个部落一样，留不住年轻人。这里年轻人的生活路径可以这样概括：“国中高中毕业以后，如果没有继续升学的话，一定是去台湾工作。”

她自己也一样。在岛上读完高中，她的家庭无法负担她出去继续读书，成功大学在兰屿的高职分班“成功商水”是兰屿的最高学府，也成了她继续就学的唯一选择。她读的是水产系，“因为当时只有水产系”。那么就读吧。

“有总比没有好，有个文凭，总比只读到国中要好找工作”。她心想。毕业之后，她便迫不及待地几个同乡朋友一起到大岛去找工作。

年轻人离开小岛，留在兰屿的多是老人和小孩。这种情况在冬天尤为明显。夏天，观光客涌入兰屿，给岛上的民宿、餐厅、潜水、导览店带来生意，也给打零工的达悟族年轻人带来工作。但每年双十节之后，东北季风开始吹袭兰屿，天气变得极不稳定，风大浪大，飞机与船班频次大减，观光客离开，也带走夏季的工作机会，直到下一年4月。台东县去年底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岛上4276个现住的原住民中，只有35%是20岁到40岁之间的青壮年劳动力。年轻人都去哪儿了？

台中和台北，是兰屿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最集中的地方。几十年外出打工，兰屿人逐渐聚集在台中的潭子、丰原、大雅、神岗，和台北的板桥、三重。女孩子大多做服务业，餐厅、超商、小店铺，也有的进工厂，例如鞋厂、纺织厂。男孩子则大多进入建筑业和制造业，做绑木工、绑钢筋工、零件加工和修理。

谢福美就在台中的顶好超市谋得了一份收银员的工作。可是在大岛闯荡比想象中辛苦太多。学历限制了她能选择的工作，辛苦，赚得又不多。早班五点多就要在公司等卸货，然后出劳力搬很重的货物，摆上货架，再做一天的收银，下班时间也不一定。工作换来的，是一个月一万多台幣的薪水，她和几个兰屿人合租，每个月一共要付八九千的租金，还要花吃饭和交通的钱。

在出去之前，她的大哥就劝她要去同乡聚集的地方，好有人照应，她听了。原因是“怕”。怕什么呢？她说：“在那边和人家也不熟，我们又是乡下来的。”而和偏乡去都会打工的汉人相比，他们的达悟族面孔又给他们带来加倍的困难。

“我们的自信心会比一般人不够。”谢福美说：“也有很多年轻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原住民，特别是在原住民很容易被歧视的年代。”

被从其他地方来兰屿的人歧视和欺压，曾是不少兰屿人的共同记忆。谢福美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听妈妈讲，那时候妈妈在兰屿读国小，只有上午教一下很简单的汉语拼音，其余时间每天都要抓“野味”给老师做午餐，还要被老师赶著上山砍柴。那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刚刚从日本政府手中接过兰屿的中华民国政府，把兰屿用来放逐犯错的军人、老师、警察和公务员。在朗岛部落经营民宿的达悟男人，也还记得小时候被籍贯山东的老师大骂：“再讲鬼话老子就毙了你！”“鬼话”，指的是达悟族的语言。谢福美母亲的回忆也是，“那时的老师都很坏，会打人，很凶”。谢福美说：“那时岛上的人很单纯，外面来的人有拿枪的，还有犯人。你不知道他们要干嘛啊，怕被打，就只好很听话。”

达悟族不是唯一被这样对待的原住民族。一直到了谢福美离开兰屿，到大岛打工的1993年，原住民还被叫做“山胞”，比“山胞”更难听的歧视性称呼，还有“山地人”和闽南语“番仔”。一年后，始自1984年的原住民族正名运动才终于争取到修宪，“山胞”被修正为“原住民”，但歧视并没有随著法律条文的变化而一夕消失。



达悟传统的捕鱼造舟，已越来越少人从事。原来达悟族评判一个家族在部落中的地位，是看男人捕鱼的多少，造舟的水准，以及女人种植芋头的多少。图为东清海湾的拼板舟与孩子们。摄：郑宇骐/端传媒

这一年，已在大岛打过不知多少底层零工的达悟族作家夏曼·蓝波安已经完成大学学位，回到兰屿另一端的红头部落，决心要把汉人在1982年塞到兰屿的核废料迁出去。而他同在大岛打工回来的妻子则是勇敢的达悟女性，出身渔人部落的她在台北的工厂曾为同乡出头，呵斥工头：“她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你不要欺负她！”

用夏曼·蓝波安的说法，这样的环境，让在大岛谋生的兰屿人“需要很多的心理调适”。更何况达悟族是台湾16个原住民族中唯一的海洋民族，属巴丹语群，和大岛原住民在脉络上又不相同，更难以融入。到谢福美这一辈，情况稍微好转，但她说，年轻人还是会“心态复杂”。

而日复一日的劳力工作，不仅重复，也让谢福美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她开始想念自己高中时的爱好：“我喜欢写东西。”她的汉语读写都还不错。在台中转眼三年，当年那个兴冲冲离开小岛的少女开始想得比较多。她说：“做服务业不是我的初衷。”换了几份工作，也都差不多。“我的出路在哪里？”

就在此时，1996年，一通电话让她回到了兰屿。她却没想到这一回去，就是21年。

回到小岛，我的文化到底是什么？

给谢福美打电话的，是兰屿第一个本地基金会——兰恩文教基金会的创办人林茂安。林茂安出身高雄，以社工身份服务兰屿21年，他邀请谢福美到兰恩文教基金会旗下的《兰屿双周刊》工作。《兰屿双周刊》是小岛第一份本地报刊，1985年创刊，至今仍在发行，最初的服务对象正是在台湾工作的兰屿年轻人，定点寄送，一解乡愁。

在网路甚至是电话都不普及的年代，双周刊成了小岛家人和大岛游子的重要沟通渠道。父母会通过双周刊给孩子留言，最受欢迎的还有谢福美负责的“乡讯”栏目，“比如这个部落哪一家生小孩、大屋落成、大船下水”。她也常常需要拿一个小DV机，去拍摄岛上的各种岁时祭仪和大小活动、比赛，拿回基金会做记录用。

搬出了在台中合租的房子，回到东清部落，她圆了自己写东西的夙愿，每天迎著海面升起的旭日骑车到美丽的八代湾，在双周刊的办公室体面地上班。日子平静，事业有了出路，

可她却看到越来越多的危机。

“交通、医疗、文化。传统技艺、祭典仪式、母语传承。外来的东西一直不断进入小岛，每个领域都在改变。”

这是她从前看不到事。在大岛闯荡后，这份扎根部落的工作推著她慢慢看回自身。比照作为他者的大岛，她看到了自己的岛屿。多年后回想，她觉得回来是一件幸运的事。“也许我没有到双周刊工作的话，就跟很多在外面工作的年轻一样，没有意识到兰屿的文化是这么重要。”

她看到这文化不仅重要，且正在逝去。和她同辈的人当中，已经有不少人和她一样，只能说少许的族语。她反思自己从小接受完全汉化的教育，环境变化，讲国语变得越来越自然，讲族语则越来越生硬，父母和孩子在家中对话，也是一半母语一半国语。“有时候我心里想的是要讲母语，可是嘴巴一讲出来就很自然，很直接的是中文。”更有些年轻人，只听得懂几个族语单字而已。



在达悟族传统里，两个单身男女决定共组家庭之后，必须离开原生家庭，在附近找一块地，盖属于自己的房子，开垦属于夫妻自己的水芋田，这才能叫做成立了“另一个家”。图为芋头田。摄：郑宇骐/端传媒

而达悟传统的捕鱼造舟，也越来越少人从事。在货币经济进入兰屿之前，达悟族评判一个家族在部落中的地位，是看男人捕鱼的多少，造舟的水准，以及女人种植芋头的多少。可是逐渐的，能用钱买到的机动船取代了亲手打造的拼板舟，外来的大米和面食取代了本地芋头所供给的淀粉，货船运来的丰富肉蛋类取代了飞鱼、鬼头刀和浪人鲙所供给的蛋白质。观光业兴起，留在岛上的兰屿人靠开民宿、餐厅、纪念品商店以及带浮潜、环岛夜间观赏来赚钱，或是进入公部门，乡公所、卫生所、邮局、警察局、天文台工作。兰屿人似乎不需要再过传统的部落生活，也可以活下去了。或者说，再靠单纯的捕鱼造舟种芋头，已经没有办法满足现代生活对金钱的需求了。

谢福美这才意识到自己原生家庭的珍贵。她是幸运的，她的家族是东清部落仅剩的几个家族渔团之一，父亲亲手打造过拼板舟，熟稔达悟族的夜历与仪式，也会亲身下海捕鱼。母亲至今在芋头田里面耕耘，会挖陆蟹，会做芋头糕。她想起自己小的时候，除了上学之外，每天都跟著妈妈上山，料理芋头田。“以前的生活很单纯，没有网路和电话，连电视都只有一两家开杂货店的有黑白的。”可她有天赐的游乐场，“小孩子放学就是山上，海边，海边，山上”。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家庭环境，她才知道从前的部落生活是什么样。她开始访谈自己的父母，一次又一次，努力地想为小岛的文化做保存。她知道自己的年纪太轻，很多部落生活已经没有办法参与，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你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文化做根基，你怎么去跟人家讲你的东西？你对自己的文化都不够了解，你要怎么让人家知道你到底是谁？”谢福美瞪大了眼睛，语气前所未有的强烈。“如果人家问我的时候，一问三不知，我会觉得很惭愧啊。”

这种强烈的自我诘问，促使她把自己的家庭拍成了一部又一部纪录片。9年前，《兰屿双周刊》给了她一个机会，去原住民族电视台做数位影音培训，她留职停薪半年，到台北学习纪录片的拍摄和剪接。在结训作业中，她记录了家族渔团五十年一遇的10人大船造舟过程。这也是她的第一部纪录片，她取名为《男人的海洋，女人的水芋田》。

男人的海洋，女人的水芋田

“我是海，我是岛屿，我是人。”这是原住民乐舞团体“原舞者”在去年的演出“Maataw浮岛”中，描述兰屿的话。达悟文化中，海洋由男人主导，陆地的工作则交给女性，部落的家庭分工才令岛屿完整。

对男人来说，与海相处的方式，除了潜水射鱼之外，还借助重要的出海工具，拼板舟。拼板舟又分为10人大船、小船、有雕刻和未雕刻的，以10人大船的地位最高。当时谢福美年近70的父亲透露心愿，要在晚年尚有体力的时候，做一艘属于自己家族的10人大船。

一艘10人大船，需要由至少5种木材打造的27块板子拼接而成，不用钉子，是为拼板舟。5种木材包括a ci yi（龙眼树）、i tap（榄仁树）、mozgi（面包树）、kolitan（台湾胶木）和poro（兰屿赤楠）。所有木材都由家族男性上山砍伐、切割成型，再组装、雕刻、上色，工程浩大而漫长。那一年，她的家族中有6个直系亲属家庭参与了造舟。

女人的工作也很繁重，谢福美跟著母亲一起，从男人上山取材的第一天起，直到大船下水仪式完成，在三四个月中每天都为家族的男人准备食物。“中午一定要有，如果男人工作到傍晚，也要给他们准备晚上的食物。”在没有外来食物的年代，这些食物就是女人种植的芋头。

下水仪式前几天，谢福美的母亲穿上传统盛装，到水芋田把成熟的芋头一颗一颗挖出来，洗干净，在仪式上堆满了大船内外，是对大船最好的祝福。父亲则带领家族的男人抬起大船，举行盛大的抛船仪式，直到护送大船下水，带回第一笔渔获。



兰屿的部落电影院是在篮球场上搭建，观众在月光下观看电影。摄：郑宇骐/端传媒

纪录片《男人的海洋，女人的水芋田》拍完8年后，谢福美的父亲去世。这段为文化保存而记录的影像，也成了她怀念父亲的方式。

谢福美之后的纪录片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她自己的身影。她拍摄母亲作为达悟女人的传统部落生活，自己也真的开始学习和思考，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达悟女人。

她在纪录片《男人不知道的事》中拍摄母亲和亲戚中的女性长辈怎样上山挖陆蟹，制作芋头糕，最后自己也穿起雨鞋，戴起草帽，趴在地上挖起陆蟹来，拍摄者变成了还不太会使用摄影机的母亲。最近两年拍摄的《另一个家》，记录她自己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Sinan Yongala之后的部落生活。

2009年，她和同属东清部落的丈夫结婚，随后生下一男一女。这时母亲告诉她，在达悟族传统里，两个单身男女决定共组家庭之后，必须离开原生家庭，在附近找一块地，盖属于自己的房子，开垦属于夫妻自己的水芋田，这才能叫做成立了“另一个家”（达悟语 matarek so vahey）。男人要开始练习造舟，造完以后就要下水捕鱼，女人种植芋头，也要学习达悟的传统织布技艺，制作衣服。

让她印象最深的，是这一句：“我妈妈那时候说，既然你们已经组织家庭了，不可能每次传统祭仪的时候，都要爸爸妈妈拿芋头给你。”谢福美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你已经是一个个体，一个单位，一个家庭，总不能每次都伸手跟妈妈要，你是没有手没有脚吗？”

就是这一句，让她在40多岁的年纪，和丈夫背上锄头，带上摄影机和三脚架，到深山里一边开垦，一边互相拍摄。“噢！那个过程。”她现在想起，仍然苦笑著摇头叹气。把一块荒地变成水芋田，需要用手拔除土地所有的杂草，用泥土围出田埂，再引山水到田里灌溉。

从第一天开垦到种下第一颗芋头苗，从没有做过农活的夫妻俩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开垦之后，种植和护育就是女人的工作了。可芋头苗从哪里来呢？还是要去找妈妈。兰屿的芋头苗算一算也有七八种，妈妈告诉谢福美，黑色茎的芋头苗果肉最好，要种在边边，

才不容易被风吹倒。种下之后，三不五时就要去除杂草、看水流、捉蛀虫，直到一年多以后芋头才能收成。

部落女人不易做，谢福美拍了那么多年，可第一次感受如此之深。“真是自己试过才知道。”

可辛苦还没有结束。好不容易种下的芋头，本以为可以在飞鱼祭前几个月收成，却遭遇了不速之客山猪。山猪会闻到芋头果实的香味，从铁丝网下面钻进田里偷吃。“结果整个芋头田被山猪夷为平地！我跟妈妈当下就直接大哭！妈妈说，怎么办啊，你们好可怜，你们第一次！”

她自己还留存一线希望，“我想说底下应该还有几颗剩的，结果一颗都没有！”可是哭完伤心完，芋头还是要继续种。“这就是部落的生活啊。在早期，没有芋头就没有东西吃，必须要种。”几个月后，她去补种芋头，但已经赶不上那一年的飞鱼祭了，只能为明年努力。

“我看到了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的文化养分。”回到小岛成为真正的达悟女人，虽然出师不利，但她仍在一步一步地练习。

怎么办呢？我们的未来

然而，今天的兰屿人已经不能再忽视货币价值。尽管谢福美非常努力地记录和保存岛屿的文化，身体力行去记住属于达悟女人的农耕智慧，可是那终究无法成为她全部的生活。她很坦白，也很苦涩。“现在住在部落很辛苦的一点是，你总是要想著钱的事，忙著赚钱。”

为了照顾家中两个年幼的孩子，她在6年前辞去工作，离开了《兰屿双周刊》。但造舟、捕鱼、种芋头，并不能带来经济收入。现在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丈夫从事观光业，她则时不时接一些关于兰屿的短片和纪录片拍摄专案，补贴家用。

什么都要钱。孩子未来读书，也一定需要钱。开垦第一块水芋田时，丈夫常常要花时间带游客来赚钱。本只能由本族男性触摸和使用的拼板舟，让女游客体验一次就可赚到几百台币。带游客浮潜一次的收入，可能比抓一夏天的鱼都要多。7-11售卖的外来食物养刁了小朋友的嘴，传统的芋头糕不加点外来的白砂糖，也有人吃不惯了，但在7-11工作的收银

员，又何尝不是迫于生计的年轻族人？既要在现代生活中谋得生存，又参与真正的部落生活，怎么可能是件容易的事呢？哪种生活是该抛弃的呢？

金钱总与传统的部落生活尤其是岁时祭仪产生冲突。每年2月到10月的漫长飞鱼祭，从大岛回来参加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她感觉到这一代已经有丧失了许多祭仪的知识，过程简化，到最后祭仪可能就会消失。

她为此感到焦虑。“这很危险，我很难去想象今后会有怎样的文化断层。时间过得那么快，哪一天老人就离开，是说不准的。”

从她18岁离开兰屿到大岛去打工，至今已过了24年，可兰屿的年轻人在高中毕业之后，仍然要面对同一个选择：留在岛上，还是去台湾？如果留在岛上，也许有机会参与真正的部落生活，但能否维持稳定的收入？如果去台湾，有机会读大学的话，读完还舍得回到部落吗？如果没有机会读大学，又是否只能永远做底层的打工族？



谢福美出席影后讲谈，接受观众提问。摄：郑宇骐/端传媒

怎么办呢？我们的未来。

就像达悟族作家夏曼·蓝波安在小说《安洛米恩之死》中的话，“必须学好华语汉字，在台湾求职谋生才有竞争力。”安洛米恩的大哥无法适应大岛的生活，在自杀前，这样提醒弟弟。小说接著写道：“然而，年少轻狂的他不认为如此……只要下海抓鱼，其他的琐事好像都不存在似的。怎么办呢？我们的未来。”

她也开始为自己的两个孩子思考这个问题。没有读到大学的我，还是希望能赚到足够的钱，让孩子去大岛读大学。读大学，自然要学好国语，可她又想在家和孩子多说族语，希望能两不误。

“这是兰屿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都一定会面临的问题。”

刚刚过去的10月，谢福美忙著给原住民族委员会提交最新的纪录片制作计划，她要拍摄兰屿快将消亡的小米文化。达悟人在不同祭仪中给小米赋予了至少二十种功能，其中已经消失的一项，就是在飞鱼祭中的祝福祭，达悟女人要以煮熟的小米点在水源地的石子上，祝福芋头田与家中的孩子。而东清部落只剩一两户人家还在种植小米，包括她的妈妈。

片名暂定为《小米的祝福》，谢福美打算请母亲带著自己和女儿，去自己开垦的芋头田上，重新做一次这已经消失了四五十年的古老仪式。

在现代性危机下，回到兰屿，并不就等同于回归了原乡。你有多认识你的家？她和几代兰屿人一样，差一点就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亲密感。为了不成为身在原乡的“异乡人”，她作为谢福美和Sinan Yongala的两种生活，都在继续。

“异乡人”栏目现在面向读者征集稿件，若你愿意分享你的异乡故事，请发送邮件至 **editor@theinitium.com**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3. 烛光集会，李兰菊发言：30年记住所有细节，记住他们生命最后的体温
4.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
5. “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6.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7.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8.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9.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10.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编辑推荐

1. 添华夏恸现场重组：第一枚催泪弹发射前后，他们经历了什么？
2. 陆委会港澳处长：“杀人案演变成进退失据，港府要负完全责任。”
3.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4.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5.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6. 李峻嶒：无大台、去中心化和“三罢”，能帮“反送中运动”走多远？
7. 核廢何去何從？瑞典過了47年，仍在繼續爭論.....
8. 这些香港老板响应罢市，休息一天

9. 香港酝酿前所未有的政治性罢工，老板和打工仔会连成一线吗？

10. 法梦：新西兰上诉庭判决指，中国有系统性的苛待被告和囚犯情况

延伸阅读

异乡人——陆颖鱼：旅行中的台湾和移民中的台湾是两件事

嫁到台湾后，香港女生陆颖鱼离开了媒体业，一番折腾摸索，今年才在台北巷弄里开了书店“诗生活”，对于她，香港人梦想中的台北是什么？

异乡人——他从战地来，想在台湾说什么样的故事？

“在我的家乡，有36万族人因为恐怖攻击成为难民，有3000多人被推下海，人们被迫在改信回教与死路一条中做出抉择。在我的家乡，因为ISIS的关系，儿童变成了孤儿、年轻妇女变成性奴隶，还有小孩被洗脑成会杀人的恐怖分子……。”

异乡人——迪迪：为什么留在家乡的儿时伙伴，看上去比在外拼搏的我更加“自由”

我从小对“最好的”有一种执念，要离开家乡小城，到最好的地方去，看最好的世界；而她却随遇而安，几经波折，留在家乡，我行我素地生活着。

异乡人——胡晴舫：为了认出自己的脸孔，我们必先认出彼此的脸孔

二十多岁开始了“国际公民”的生活，旅行、工作、写作。她从不信任人性，到仰赖“陌生人施舍的慈善”走到今天。作家胡晴舫完成《无名者》后说，真正的写作才刚刚开始。

异乡人——唐南发：身为华人，对“排斥和歧视”知之甚深，我要帮助难民融入社会

在马来西亚长大，我鲜有异族朋友；在伦敦生活，亦非社会主流……那些经历告诉我，即便游走在社会边缘，也有权参与这个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